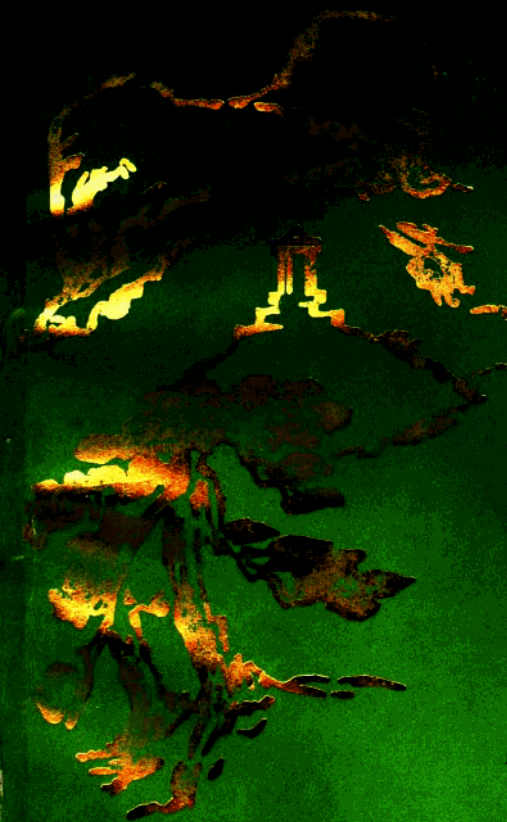


英名千古

衡阳市革命烈士事迹选（六）



本书编者名单

主 审	霍占荣		
主 编	苏少田	左 焱	
编 辑	马拱正	董文林	徐宗太
	郑 敏	赵炜生	肖连军
美术编辑	杨振寰		

目 录

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

- 北方早期工运领导人史文彬生平事略 (1)

鞠躬尽瘁为人民

- 记孙先舟烈士生平 (23)

英雄谱写英雄篇

- 记王心一烈士的事迹 (42)

他坚定地走上武装抗日的路

- 记张捷三烈士 (53)

- 英雄连长何万祥 (60)

铁路工人的榜样

- 记王伯泉烈士的事迹 (73)

侠骨义胆

- 记高佃文烈士 (82)

白云山区立功绩

- 记陈凤亭烈士 (91)

- 一级战斗英雄李守禄 (99)

忠魂紧系故乡情

- 记王大海烈士的事迹 (114)

铁骨铮铮 英勇不屈

- 武子刚烈士传略 (120)

- 刘志霞式的女烈士——吴瑞兴 (134)

“一门三英”中的王坤锡	(140)
英勇不屈的民兵班长张其怀	(150)
大功班长	
——韩其正烈士生平纪实	(155)
披肝沥胆 捐躯淮海	
——记战斗英雄胡承祥烈士的事迹	(170)
指挥炮兵显神威	
——记高振祺烈士的事迹	(180)
戎马十年	
——记张涛烈士的事迹	(202)
“铁马”奔腾运输忙	
——记李文福烈士的事迹	(218)
浩气焕北斗 英名镌云山	
——记王焕斗烈士的事迹	(226)
人民的公仆刘学圃	(237)
光照人间	
——记赵卿烈士的事迹	(252)
舍身救战友	
——记孙丹宁烈士的事迹	(261)
战斗的一生 光辉的榜样	
——记高庆常烈士的一生	(268)
人民的忠诚卫士	
——记警卫战士杨杰烈士	(284)
全国好儿童王勇	(298)
汪达军勇于为人民献身	(302)

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

——北方早期工运领导人史文彬生平事略

张 传 华



中国共产党“六大”中央候补委员史文彬，是我国北方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导人之一。他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京汉铁路总工会副委员长、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等职。在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他率先创建了北方地区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组织——著名的长辛店铁路工人俱乐部；参加和组织领导了轰动全国的“二·七”大罢工，掀起了我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为我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

史文彬是旧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同那时的大多数产业工人一样，他也走过了一条从破产农民流入城市后，辗转加入产业工人队伍的曲折道路。

一八八七年农历十月十五日（公历十一月二十九日），史文彬

出生在山东省青城县（现淄博市高青县）史家庄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里。父亲史德森、母亲史李氏都是勤劳节俭的农民。他兄妹五人，上有一兄两姐，下有一妹，七口之家仅靠几亩时常遭受黄河洪水侵害的河滩地过活。平常年景尚难维持生计，如遇水灾，只得流离失所，求亲告友，度日艰辛。

贫苦农家总是希望孩子降生能招财进宝，盼望孩子长大成人能富贵门庭。因此，史文彬出生时，父母给他起了个象征财富的乳名——“银子”。启蒙入学时，塾师才给他起学名史文彬。然而，良好的愿望并不能改变严酷的现实。史文彬的童年时代正是满清王朝末年，内有清廷腐败，外有列强侵略，连年兵荒马乱，民不聊生。“银子”的降生非但未能“招财进宝”，反而屡遭厄运。一八九五年盛夏，“银子”还不满八岁时，青城县暴雨如注，肆虐的黄河再次泛滥成灾，青城县“全境成泽国”。史文彬家几亩滩地被淹没，五间土屋倒塌，史家赖以糊口的一点家业全部被洪水夺去。父亲史德森被迫携带家小去济南逃荒。

史文彬一家到济南后，靠亲朋资助，父亲才在西更道胡同租赁了几间临街房屋，开了一个小杂货铺，贩卖家乡特产“桑皮毛头纸”等，以此作为全家生计，史文彬也得上学读书。本来，杂货铺就是本小利薄，收入甚微，生活仅得温饱，不料祸不单行。一八九九年，因受街痞欺压，史家吃了一场官司，杂货铺被迫停业，举家更加赤贫，只得住进废弃的关帝庙里。不久，父亲史德森、母亲史李氏皆因过度悲愤，贫病交加，先后去世。

父母过世后，年仅十四岁的史文彬只好跟兄嫂生活。怎奈哥哥史文城没有寻得职业，唯有依赖嫂子揽些绣花活计挣钱糊口，根本无力供史文彬继续求学。聪明懂事的史文彬深知家境困难，生怕哥哥为难，便主动提出退学。哥哥身受父亲去世前的重托，怎能忍心可爱的弟弟中途辍学？正在为难之际，听说有个教会办的“济南分益学校”，招收半工半读的学徒生。哥哥喜出望外，便求

人托面，把弟弟送进了这所学校。史文彬懂得，这个机遇是多么来之不易啊！于是，入学后，一方面勤奋读书学习，一方面刻苦钻研技术，三年学徒期满，又按契约无偿谢师三年。六年的勤奋学习和生产实践，使史文彬既学到了较多的文化知识，又掌握了精湛的生产技术，一九〇七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转入济南铁厂做工。这时，史文彬已经是二十岁的青年汉子，并像许多工友那样，从一个破产的农家子弟踏进了产业工人的行列。

二

史文彬童年的苦难，少年的坎坷，使他既饱尝了旧社会劳苦大众生活的困苦艰难，也磨炼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不畏强暴的性格。因此，史文彬入厂后，面对厂主的骄横，工头的残暴，广大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加之当时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即将崩溃，帝国主义列强更加肆无忌惮地疯狂掠夺，萌发了强烈的反抗思想。起初，他只是暗中串连个别工友，用消极怠工、破坏工具设备的办法进行反抗，并未引起厂方注意。一九一二年秋，他公然发动组织工友，同作恶多端的工头展开了面对面的公开斗争，斗得工头理屈词穷，狼狈不堪。厂主得知后，立即勾结警察赶来镇压，并密谋逮捕史文彬入狱。史文彬闻讯后，在工友的帮助下逃离铁厂，先在历城县姐姐家中躲避，后又另谋生计。这次斗争是山东产业工人中较早的一场自发斗争，虽然没有引起大的波澜，但也起到了唤醒工友、打击厂主、工头气焰的作用。

一九一二年隆冬，经朋友推荐，史文彬长途跋涉，到了地处北京西南郊的长辛店铁路工厂应考。考试时，他被带进一处铁工车间，主考人随手扔给他一把锉刀和两块厚铁板，要他做成一个六棱螺栓顶和一个六棱座孔，然后把做好的螺栓放在座孔内，要求从上面滴水，达到丝毫不漏，方为合格。史文彬凭藉在公益学

校和济南铁厂先后十年做工时练出的精湛钳工技术，很快做成了螺栓和座孔，两者座在一起，结合严密，滴水不漏。起初还报着一副生硬面孔的主考人，这时才露出一丝微笑。史文彬被录取了，分配到铁路工厂的铆工场（车间），当了一名白铁工（钳工）。

长辛店铁路工厂是鸦片战争后，法国和比利时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开办的一家大型机车修理工厂，专事京汉铁路北段的机车修理业。这里工厂规模宏大，机器设备先进，是当时国内比较先进的大型工厂。数千名职工多数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史文彬入厂后，由于他为人忠厚，办事公道，加之技术熟练，乐于助人，很快赢得了工友们的拥戴和信任。在短短几年里，他就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穷哥们。一九一五年，史文彬二十八岁时，在众多工友的帮助下，与铁路沿线固城镇张家胡同一个名唤香儿的张氏姑娘结婚。这位穷苦人家出身的妻子，一生与史文彬相濡以沫，是史文彬革命事业和生活上的忠实伴侣。

本世纪廿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军阀混战的战乱岁月，连年的兵燹、灾荒，使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长辛店大街上，逃荒的人群，饿毙的乞丐，举目可见。史文彬所在的工厂里，依然是洋人当道，监工横行，工人们当牛作马。面对如此悲惨情景，史文彬和他的穷哥们愤愤不平，他们时常议论，怎样才能使天下穷人都得有饭吃？怎样才能打破这个不公平的世道？！

正当史文彬和他的伙伴们百思不解的时候，一九一八年秋冬之际，蔡和森、肖子升等人组织的湖南赴法勤工俭学学生，来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半工半读。这些贫苦有志的学生，得到了史文彬等人的热情帮助。据当时参加过半工半读的何长工同志回忆说：“记得我们那位麻子师傅（指史文彬——编者注），钳工技术很高。他拿来圆钢，要我们锉成三角形或六角形。锉完了，他就把工件放在抹了油的平面样板上检验，如果有的地方没粘上油，那就是没有锉平，还得锉。他很严格，一点也不放松。老师傅费了很大

苦心来教我们，把自己的全部本领拿出来，唯恐我们学不会。希望我们在国外勤工俭学中有生活本领，可以求得些革命救国的办法。”史文彬最爱帮助学生，也从学生们带来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进步刊物上读到了李大钊同志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劳动神圣》等宣传革命道理的文章，听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启发了他的革命思想。特别是这一年的十一月上旬，毛泽东同志风尘仆仆地来到长辛店铁路工厂，看望湖南学生，考察产业工人的劳动、生活状况。他深入工场，和史文彬等工友们促膝谈心，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毛泽东同志的谈话，在史文彬眼前展示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使他开始懂得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初步了解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决心投身到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伟大斗争中去。

三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后，消息很快传到了长辛店。史文彬和工友陶善琮等受到莫大鼓舞，他们立即组织工人们，以实际行动支援学生爱国反帝运动。当时长辛店铁路工厂的副厂长刘家骥，是臭名昭著的卖国贼曹汝霖的女婿。这个家伙依仗曹汝霖撑腰，平时就横行霸道，欺压工人。“五·四”运动兴起后，他又极力反对学生运动，千方百计压制工人起来斗争。他公开扬言“谁闹事就开除谁”，还辱骂进步工人是“劣马害群”。史文彬气愤不过，便发动部分工友，手持工具，抬着煤油桶，一举焚烧了刘家的大门。一向盛气凌人的刘家骥见势不妙，顿时似丧家之犬，仓皇逃窜，广大工友闻讯后，无不拍手称快。

六月三日，北京军阀政府疯狂反扑，逮捕爱国学生近千人，激起了长辛店铁路工人的极大愤慨。五日夜晩，他们在史文彬等人的组织带领下，手举红灯，走上街头，连夜举行示威游行，声援

北京学生。愤怒的工人们高呼“打倒卖国贼!”“释放爱国学生!”等口号，从而开创了北京工人阶级首次上街示威游行之先河。

六月中旬，长辛店地区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它的下属组织“救国十人团”。史文彬作为工人代表，被推举为联合会的委员，从此，他专门从事反帝爱国运动，组织工友参加各种反帝爱国活动。在史文彬组织带领下，十人团成员经常打着旗帜，在工厂附近的大井、琉璃河等集镇演讲；他们还挎上布袋，到车站、商店门前，叫卖国产“无敌”牌牙粉等国货，号召群众抵制日货。一时间，长辛店一带也出现了以买国货光荣、买日货为耻的反帝爱国热潮。

同年八月，长辛店“救国十人团”派出以史文彬为团长的代表团，去北京参加为反对山东镇守使马良枪杀回族救国领袖马云亭的请愿大会。在坚持了三天三夜的艰苦斗争中，史文彬和大伙白天进行讲演宣传，夜晚聚集在总统府门前露宿，直到取得斗争的胜利。

通过伟大的“五·四”运动，北京大学涌现出以邓中夏等为代表的一批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提倡“平民教育”，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决计把学生运动和平民教育结合起来。一九二〇年四月，当春暖花开、万物复苏之际，邓中夏等人带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来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展平民教育活动。史文彬等给予热情欢迎和接待，并从此与北大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是年冬，建立不久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决定在长辛店创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以此作为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工人运动的基地。经史文彬、陈励茂等人热心操办和邓中夏、张太雷的大力帮助，一九二一年一月，“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史文彬被选为学校委员，同时作为学员积极参加学习。经常到校讲课的除邓中夏、张太雷外，还有何孟雄、张国焘、罗章龙等。李大钊有时也到校讲课。他们以生

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述“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工人阶级如何翻身解放”等道理，使学员们思想大为开阔，有效地启发了工人的阶级觉悟。由于史文彬学习积极，表现突出，不久就被吸收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该小组中唯一的工人成员。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创建，不仅为中国工人运动培养了以史文彬为代表的一批骨干力量，为以后建立工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而且也是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由北而南的开始，是共产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的最早的一个起点。正如邓中夏在其所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中所说：“长辛店和小沙渡两地都是中国共产党最初做职工运动的起点。”换言之，长辛店也就是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发祥地。

四

光阴似箭，转眼到了一九二一年的五月。这时史文彬已是三十四岁的壮年人了。

“五·一”节，这个今天妇孺皆知的国际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节日，七十多年前，在长辛店工人中却是鲜为人知的，更不要说举行纪念活动了。史文彬在劳动补习学校学习时，听老师们讲起“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和世界各地纪念“五·一”的情况，便和老师、学友们商量，也举行一次“五·一”节纪念大会，并及早成立工人自己的组织，深得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支持。经过紧张的宣传和准备，在共产主义小组的直接领导下，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长辛店铁路工人近两千人破天荒第一次举行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参加大会的除当地工人外，还有来自天津、保定等地的工人代表。大会开始后，首先由“劳动补习学校”的学生唱纪念歌，接着由史文彬代表长辛店铁路工人报告工会组织经过，当场通过了成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工会）的决议和俱乐部章程。大会结束后，史文彬亲自带领工友们高举着

“劳工神圣”、“八小时工作”等旗帜，高呼“劳动万岁”、“五一节万岁”等口号，举行了颇具声势的示威游行。兴高采烈的游行工人们引吭高歌，唱起自己编写的歌曲：

如今世界太不平，
重重压迫我劳工。
一生一世做牛马，
思想起来好苦情。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
惊醒了我们苦弟兄。
无产阶级快起来，
拿起铁锤去进攻。

红旗一展千里明，
铁锤一举山河动。
只要我们团结紧哪，
冲破乌云满天红。

雄壮嘹亮的歌声，首次震荡在古老的长辛店小镇的上空，它预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空前觉醒，也预示着一场真正的红色风暴的来临。邓中夏盛赞这次游行是“中国空前未有的真正的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

“五·一”节后不久，一个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会组织——“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史文彬当之无愧地被选为俱乐部委员长。“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像一股强劲的东风，迅速传遍各地。影响所及，自北而南，蔓延到各地。在当时工人们仿佛觉得长辛店是工人的“天国”，于是各处纷纷派代表前来长辛店参观。消息传到济南，津浦铁路大厂也派李广义、黄锦龙等工人代表前来长辛店参观学习，回去后，依照长辛店的经验，成

立了山东第一个工会组织——“津浦大厂工人俱乐部”。当年七月一日在上海出版的《共产党月刊》刊出文章，盛赞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办得很有精神。他们的努力实在令人佩服，不愧为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通过创办劳动补习学校，组织“五·一”节游行，创建工人俱乐部等一系列革命斗争实践，使史文彬阶级觉悟大大提高，思想逐渐成熟。在这些斗争中，也充分表现出他那非凡的组织才能和忠于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崇高品质。当年邓中夏在谈到史文彬时，无限深情地说：“无论按阶级成份，按觉悟程度，按人的诚恳忠实，史文彬都是最可信赖的一个。”正是由于史文彬已经具备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必要条件，因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当月——一九二一年七月，史文彬经邓中夏介绍，在长辛店附近的二仙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建党后最早入党的工人党员之一。

五

史文彬入党后，立志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终生。在党的领导下，他的奋斗目标更加明确，革命意志更加坚强，工作更加积极主动。在厂内，史文彬和工人俱乐部的委员们带领工人开展了“斗监工”、“打工贼”、“撵厂长”、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工人生活待遇和劳动条件等斗争。一九二二年五月，他们首先严惩了无理欺压工人的监工邓长荣，又痛打了为虎作伥的工贼谢德清，接着同心协力，一举撵走了剥削成性的比利时籍厂长祚曼。在社会上，史文彬和工人俱乐部的委员们尽力支援北京郊区菜农反对政府苛捐杂税的斗争，经常参加和支持京汉铁路沿线以及其他区工人俱乐部开展的活动。同年四月九日，史文彬出席并主持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第一次代表会议，同时被吸收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的成员，负责组织领导北方地区的工人运动。

在史文彬组织领导的一系列革命斗争活动中，规模较大、影

响深远的，要数他亲自发动和直接领导的长辛店“八月罢工”。这次罢工发生在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仅历时两天，即获全胜，在北方铁路工人中产生了极大反响。为组织这次罢工，史文彬真是费尽了心血。

就在罢工之前的八月十一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员在郑州召开了第二次代表会议，史文彬被选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会议根据中共“二大”决议精神，决定“由长辛店工人发起全路总同盟罢工，作第一次经济奋斗。”组织领导罢工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史文彬肩上。史文彬懂得，从前创办劳动补习学校，组织“五·一”节游行，建立工人俱乐部以及“打工贼”、“撵厂长”等等，并未触及到资本家的痛处，也不影响广大工友的生活，搞起来比较顺利。现在组织罢工，就是要工友们放下手里的活计，同资本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而另一方面，就是要资本家不能任意剥削工人，困难可想而知。史文彬和工人俱乐部的委员们经过多次研究，认为组织罢工的关键，在于能否抓住契机，把广大工友发动起来。就在这时，八月十六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通过各大报刊，发布了“劳动法大纲”十九条，其中心内容是要要求劳动者有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权利，对工资福利、工作时间、保护女工、童工等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大纲发布后，立即受到全国广大工人的拥护。这对正在酝酿罢工的长辛店铁路工厂的工人俱乐部委员们，是一场及时雨，是再好不过的罢工契机了。于是，史文彬立即召开工人俱乐部委员会，根据大纲的有关条款，结合铁路工厂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以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革除工头“五强”等为主要内容的九项要求，并迅速递交铁路工厂方和京汉铁路管理局局长赵继贤，要求限期给予答复。与此同时，史文彬和全体工人俱乐部委员分头深入到各工场、车间、宿舍、工棚，进行细致的组织动员工作，准备一旦资方拒绝九项条件，就立即发动罢工。

一向反对职工运动的赵继贤等人，根本无视工会的合理要求。起初施展拖延策略，不予理睬，拖到八月二十三日，公然拒绝了大会的要求。当晚，史文彬在邓中夏等人指导下，召开了工人俱乐部委员和积极分子会议，决定自二十四日起举行罢工。会上对罢工的各项组织指挥、活动地点、罢工条件、如何谈判以及工友的生活安排等，史文彬都一一作了详细的部署。会议结束时，史文彬高声鼓励大伙说：“明天的事，大伙不要担心，咱们一定要胜利！要给那些家伙看看，咱们工人的骨头是硬的！”

“呜——呜呜——”二十四日凌晨，随着汽笛的长鸣，罢工开始了！在史文彬的领导下，三千多工人都参加了罢工，铁路工厂里所有车间的机器都停止了转动；在长辛店车站，所有的机车都熄了火，货车、客车全部停驶，昔日熙来攘往的车站，变得冷冷清清。面对声势浩大的罢工浪潮，中外资本家和他们的大小工头们，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

长辛店工人罢工开始后，京汉铁路中段和南段的工人立即响应，迅速形成同盟大罢工的态势，致使南北交通中断。消息传出后，陇海、津浦等铁路工人致电长辛店工人俱乐部，表示声援；京绥、京奉等铁路工人也派来代表，以示慰问。罢工浪潮呈不可阻挡之势。

在汹涌澎湃的罢工浪潮面前，京汉铁路局长赵继贤等人方知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巨大力量。他们深恐事态扩大，罢工蔓延全国，只好答应二十六日与工人代表谈判。在谈判桌上，史文彬代表工人利益，据理以争，终于迫使资方答应了九项条件，即：开除了“五强”之一的坏工头郭福祥等人；自九月起，全路两万多工人，每人每月增资三元；两年以上的工人一律改为长牌工人；罢工受伤者不得罚款、扣薪等。罢工取得完全胜利。广大工友无不欢腾雀跃，纷纷跑到俱乐部，向史文彬表示衷心的感谢。为罢工熬红了双眼的史文彬，也面带笑容，紧握着每个工友的双手，连

声说道：“谢谢大家。”通过这次罢工，史文彬在工友中的威望进一步提高了，真正成为广大工友一致拥戴的工人领袖。

六

一九二三年爆发的“二·七”罢工斗争，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作为这次罢工斗争组织领导人之一的史文彬，也是他革命生涯中最光彩夺目的一页。

自一九二一年以来，京汉铁路各站相继成立了十六个工会组织。一九二二年四月，开始酝酿建立全路总工会，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到一九二二年底，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就拟出了工会章程和各项决议，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于是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五日召集全路代表开会，决定二月一日在郑州举行全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身为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的史文彬，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负责人罗章龙等都提前来到郑州，准备按时召开成立大会。直系军阀吴佩孚闻讯后，深知京汉铁路处于他统治的心脏地带，是他的重要财源之一。建立全路总工会，势必在政治、经济诸方面对他造成严重威胁。于是便撕下他一贯标榜“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公然派出军警，封锁会场，恐吓工人代表，禁止开会，并要总工会代表去洛阳“计议”。为争取如期开会，史文彬、李震瀛等5人受筹委会委托，立即赶赴洛阳。他们与吴佩孚进行谈判中，起初吴佩孚还假惺惺地说：“我一向是保护劳工的。现在时局不稳，岂能开会……”史文彬据理力争，严词告诫：成立总工会是我们工人的权利和自由。根据“劳动法案大纲”，人民有集会、结社的权利。工会成立大会我们一定要开。吴佩孚见工人代表态度强硬，恼羞成怒，公然威胁说：“你们非要在郑州开会，那我可就对不起啦。”说罢拂袖而去。史文彬等不畏军阀淫威，毅然决定大会如期举行。

二月一日凌晨，反动军阀宣布在郑州实行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关店闭户，行人断绝”，到处是一片阴森恐怖气氛。但是，六十五位代表和一百三十多位来宾不为武力所屈，仍然“全体整队向会场进发”。大会开始后，在史文彬等人主持下庄严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当反动军警和骑兵持枪挥刀冲击会场时，与会代表和来宾振臂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强权无公理，工人要自由！”等口号，根本不把敌人看在眼里。

为了抗议反动军阀的蛮横干涉，总工会党团当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二月四日举行全路总罢工。并发表宣言，号召全路工人起来“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还成立了以杨德甫为委员长、史文彬为副委员长的罢工委员会，具体负责组织全路罢工事宜。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史文彬顾不得连日操劳的疲惫，星夜返回长辛店，召开党团和工会委员会，传达郑州会议决议，研究布置长辛店罢工计划。鉴于郑州开会时的经验，史文彬告诫大伙说：“吴佩孚在郑州公然动刀动枪，禁止开会，说明我们这次罢工不会那么容易，要么是胜利，不然就是妥协。我们要多想想军阀可能采取的手段。”经史文彬提醒，大伙共同制定了应付各种局面的罢工方案。

二月四日上午九时，一声汽笛响过后，工人们立即放下镢刀，丢掉铁锤，熄灭炉火，切断电源，三千多工人潮水般地涌向罢工誓师大会会场——娘口言。史文彬站在高台上，以洪亮的声音，首选宣读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统一拟定的罢工宣言。接着以坚定的目光环顾会场一周，发表了铿锵有力的讲话：民国约法说，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工人也是人民之一分子，为何我工人无有！？古语道：“不自由，勿宁死”。我们要争我们的自由，争我们的人格。我们要向侵略我们自由的人宣战！我们的一切行动要听从总工会的指挥！会场上立即响起雷鸣般的口号声：“罢工！罢工！”“服从